

清前期 雕竹伏虎羅漢

嵇若昕

宋代大文豪蘇軾曾說：「無竹令人俗」。在飲食文化中，竹筍是一種可以作為酒宴佳餚的菜蔬；在繪畫中，「墨竹」可以成為獨立的畫科；在工藝領域中，竹編、竹刻與竹器製作（如竹家具等），都是獨立的一門藝術。其中尤以竹刻藝術，自從明代中期成為獨立的藝術之後，就深受文人喜愛，深深地擄獲了士子的心。當時竹刻藝術活動的地區主要是江蘇的金陵地區與嘉定地區。金陵地區的竹刻藝術至清初而漸趨沒落，嘉定地區的竹刻藝術，在「嘉定三朱」（朱鶴、朱纓、朱稚征）之後，繼之者眾，代不乏人，竹刻成為當地特產，康熙中後期（一六八三—一七二二）至乾隆前、中期（一七三六—一七七五）嘉定竹刻藝術的發展達到巔峰，「嘉定竹器為他處所無」，而且「非嘉定人不能傳此法」。嘉定竹刻不但聲名遠播，而且聲震內廷，「與古銅、宋磁諸器並重，亦以入貢內府。」

封氏一門與施天章

康熙乾三朝，嘉定地區的竹刻品除了被貢入內廷外，當地竹人也受到皇帝的青睞，進入內務府造辦處供職、當差，其中最受矚目者可推封氏兩代及其弟子中的施天章。

嘉定封氏先世於明代時以工詩善畫，名載邑乘，至清初封錫爵輩，才以刻竹名世。封錫爵字晉侯，與弟封錫祿（字義侯，晚年號廉癡）、封錫璋（字漢侯）同以竹刻聞名於世，當時號稱「鼎足」。清聖祖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封錫祿與封錫璋因聲聞於朝，同時入直內廷養心殿，封錫爵則家居杜門。金元鈺在《竹人錄》書中對嘉定封氏的「竹根人物」相當推崇，認為嘉定一邑的竹人中，「盛於封氏」，並以封錫祿所製者最精，他所做「梵僧佛像，奇蹤異狀，詭怪離奇，見者毛髮聳立」，當雕製「採藥仙翁、散花天女，則又軒軒震舉，超然有出塵之想」。

封錫祿與封錫璋入直內廷不久，封錫祿便以顛病回歸故里，歸家時

「一時名流咸題詠，以誌其遇」。此時封錫璋可能仍留在京城為皇帝服務。

除了竹刻，封錫祿也擅長用桃核雕製核舟，多取蘇軾泛舟赤壁故事；另外，他也擅長在橄欖核上鐫刻山水人物，景物摹繪逼真，出人意表。

封始鎬（字彝周）、封始翹（字綿周）與封始岐（字時周）是封錫祿的子姪輩，金元鈺於《竹人錄》中僅載封始翹是封錫祿的兒子，「藝不在乃翁下」，但是光緒七年（一八八二）《嘉定縣志》則載此三人皆為封錫祿之子。無論如何，三人皆擅長刻竹，封始鎬與封始岐於雍正初期即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當差，在宮中他們的姓名分別是封鎬與封岐。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十一月下旬，員外郎沈喻會統籌為六位南匠撰寫一份漢字啓摺呈怡親王，摺子中寫著：「雕竹匠封岐……為省親完婚事」告假四個月。當郎中海望開寫請假匠役的籍貫與養贍之人的啓摺時，又為封岐表達其告假期間願由其弟封鎬代替當差，海望「看其手藝還

好」，欲暫時將封岐月份錢糧銀給封鎬食用，俟封岐回來時再由封岐當差；怡親王也准許了封鎬代替之事。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曾記載：當時封岐的月份錢糧銀是五兩。封鎬代替封岐當差時，封岐是「雕竹匠」，故封鎬應也是以「雕竹匠」身份替代之，而且封岐以正工匠人身份當差時，封鎬或許以副手或助手身份協助之，如此他才能於兄長告假時，立刻替代之。封岐假滿回京，仍入宮服務，封鎬遂退回副手或助手的身份，當封岐晉升為牙匠時，封鎬或也隨之協助象牙雕刻工作，但不能算是正式的宮廷牙匠。

除了雕刻象牙，封岐也會髹塗漆汁，他曾於乾隆初期成功地將雕刻與髹漆技藝結合恢復造辦處的雕漆技藝，雍正年間他也曾因為能髹塗漆汁，奉派與漆匠離開紫禁城前往九鳳朝陽山去「漆靈芝」，怡親王還下命：路費與雇車所需銀量動用造辦處錢糧發給。此批靈芝生長於九鳳朝陽山，尚未採摘，摘下蒸過後與罩籠、罩漆一樣不會生蟲。最後怡親王僅下



令前去看看，了解是否應摘取，不必罩漆。因此，此次封岐並未前去為新鮮靈芝髹漆，但是由此則檔案可知他能髹漆，此技藝也深受怡親王重視。

乾隆元年四月清高宗看到所呈送進來封岐的作品，直誇「好」，並下令「賞紗一疋」，員外郎常保遂趁機奏說：「牙匠封岐每月所食五兩錢糧銀，『不敷用度』。清高宗聽聞後立刻下旨：封岐『每月加銀三兩』。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底，封岐因母喪告假四個月回籍葬親並請接家眷來京，「永為報效」。清高宗不但准給假四個月，且同意其攜家眷進京，並下旨賞銀三十兩，還命蘇州織造海保料理其往返盤費，恩遇實隆。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匠役分成南、北匠，南匠中又分為「抬旗南匠」、「供奉南匠」與「傳差南匠」。「供奉南匠」必須年老後，方始放回原籍；「傳差南匠」則是因為某種製造需要，而招募入京的南匠，一旦竣工，即資遣回籍，乃臨時之南匠；至於「抬旗南匠」乃不論種族，隸籍內務府，永不歸南，此在當時為一種榮

寵。封岐奉准攜帶家眷進京，但不知是否准許他「永為報效」，因此當時封岐應被提昇為「抬旗南匠」或「供奉南匠」。

雍正、乾隆時期，除了封岐與封錫之外，內廷另有一位嘉定竹人當差，即施天章（字煥文）。施天章可能生於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工繪畫，擅長南宋馬遠、夏圭的畫風，又擅長以竹子的地下莖作立雕人物，是封錫祿的弟子，《活計檔》中未曾記載其何時入宮服務，但是雍正九年五月封岐蒙賞賜銀六兩的同時，施天章蒙恩賞銀十兩，乃同批賞賜匠役中賞銀最多的六人之一。可見得在雍正皇帝的心目中，施天章應比封岐更受賞識。

除了賞銀較高之外，在雍正朝的《活計檔》中尚曾記載施天章受命認看「茄楠香數珠（隨鶴頂紅佛頭四個）」，結果他認看「係好的」。除此之外，他也身兼造辦處做活計的管理工作，他曾因南匠製作活計的空間不夠，轉述郎中海望傳達的旨意：「著將花兒作一間頂隔另新糊

飾，給南匠等作活計。」雍正十年（一七三二）的《活計檔》還多次記載皇帝交出玉石、象牙等器物要求配製座子，也曾交出玉石盆景，不但需照其式樣另做幾件，還須為其配製一合牌匣。除此之外，此年還兩次傳作備用之象牙茜色福祿壽陳設器以及龍油珀各式器皿。這些旨意以及皇帝交出的器物都是「交牙作南匠施天

章」。乾隆元年的檔案中也曾記載施天章轉交太監毛團交出的「海蘭松木筆格一件、筆格銘一張」，並傳達皇帝旨意：「著配座子檀木匣一件，將銘刻在匣蓋上。」因此，雖然金元鈺在《竹人祿》中記載：「乾隆初，念其淹久且技之工也」，官九品職的鴻臚寺序班，但個人仍以爲施天章在雍正晚期或已官鴻臚寺序班，時人楊伯達也認爲施天章在雍正時期「紅極一時」。

施天章除了善於雕刻竹、牙等器，或亦擅長設計盆景，按：嘉定竹刻藝術的創始者——嘉定三朱之父朱纓與其子朱稚征除了書畫雕鏤外，亦擅長栽種盆景，至清代初年竹刻與盆栽



都成為嘉定特產。施天章承繼了嘉定竹刻中以竹子的地下莖進行立體雕刻的傳統，或許也能設計盆景，因此乾隆元年二月曾交給他一批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交出的玉石、瑪瑙原材，由他「持進擺山子用」。

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初，清高宗命太監拿出三百九十三方石章，交給施天章與另一位「作牙活南匠」葉鼎新，命他們「隨做收拾，有字者磨去」，並為之設計、製作一個鑲嵌紋飾的木箱來擺放它們。如此經過了一年多，第二年五月皇帝傳旨將施天章送出「如意館」，但是「仍在造辦處（牙作？）……行走」，而且「每月賞給下等錢糧」。

如此殘酷的打擊，或許讓原先在匠役中地位崇高的施天章承受不住，遂在六月十三日私自離開紫禁城「出走」，第二天內務府大臣海望經司庫劉山九與催總白世秀呈報後，派出造辦處管理人員在京城內外尋覓了數日，仍不見蹤影。海望「恐其思鄉南歸」，復遣多人分別由水陸兩路追尋，沿途各檢查站需「挨查糧船」，

並「寄字」蘇州織造安寧，命他派人到施天章家密訪，如果施天章回到家，立刻「拿送來京」。不久拿獲歸案，被判在瓮山（今頤和園萬壽山）鋤草養馬，幸賴忠勇公傅恆斡旋轉

圜，得以放歸回籍。此時他已得病，「不復鏤刻，偶成一物，隨即焚棄，作畫亦然，故真跡流傳甚鮮」。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七十三，卒於女婿王謙家中，旋即葬於家鄉，



至光緒初年，其墓尚在。

施天章自幼習刻竹藝，學習嘉定竹刻中以竹子的地下莖「就其高卑、曲折、淺深之宜，刻為人物、山水、果蓏、花卉」，而最工「竹根人

物」。他所刻人物的「手足之位置，衣服之瀟灑，面目之神理，皆極生動」；所刻老者「則雞皮鶴髮，脅肋之骨，結喉露齒，悉可指數；笑、語、喜、慍，若有聲響」；所刻「果

實、花卉，皆如新摘」。雖然享有長壽，又曾供直內廷，但因獲譴回籍後不常從事雕鏤，偶有作品，旋即毀棄，故而傳世中少有雕刻施天章名款的竹製品或牙雕品。但是台北故宮博物院卻珍藏一件他於乾隆二年（一七三七）用雞血石雕製的赤壁圖石印章。

清前期 雕竹伏虎羅漢

呂一六八二之十八 / 故雕 17 / 院 1959
 高八·一五公分 底長七·六四公分
 底寬三·二八公分 連木座高九·一公分

這件雕竹伏虎羅漢乃用竹子的地下莖，圓雕一羅漢坐於石上；羅漢雙臂下伸，交指下按，張口睜眼，做打呵欠狀；其右足倚於石上，左足置於一伏地虎背，口中牙齒歷歷可數；老虎雙眼圓睜，也張口露齒。人物身軀比例勻稱，形象生動，老虎則好似民間虎爺玩具造型，可見雕刻者精於人物，對於老虎的造型則略顯生疏。

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封錫祿所雕製的羅漢像（No. 25380，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以前入藏），高一五公分，乃在竹子的地下莖上，雕出一羅漢坐於



石上，雙臂下伸，交指下按，張口微閉目，雙睛似填玳瑁小片，雙足跣置石上，右腳趾上翹，好似困倦已極，呵欠忽作。器背左下近衣袍處的坐石上陰刻「封錫祿造像」五字。時人王世襄認為這件作品是他所僅見封錫祿的真跡。

審視這兩件同用竹子的地下莖雕成的羅漢，姿態基本一致，尺寸上，則封錫祿所做者較大。封錫祿所做的羅漢面龐較豐腴，壽耳垂肩；故宮所藏者額骨高聳，因張嘴而兩頰下陷，似乎較為清瘦；然而，若觀賞者將目光下移至羅漢胸膛，前者肋骨歷歷，彷彿皮包骨，後者雖亦露出肋骨，但是胸肌隆起。在肌理上，若雙臂下伸，用力交指下按，胸部肌肉理應隆起；而且，兩件羅漢像的雙臂皆見堅實的肌肉，封錫祿所做者因左小腿露出，右小腿也露一小截，所表現的人物有堅實的小腿，加上豐腴的面龐，何以胸部卻是皮包骨？相較之下，故宮所藏的這件羅漢像，表現技巧更熟練，人物肌理掌握得更得心應手。

傳世竹刻品中，有一件封始岐

的〈圓雕伏虎羅漢〉，原為鄭葉崇範藏品，今藏於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博物館（Nelson Gallery-Atkins Museum, Kansas City），器高七公分，器背座石上有「封始岐製」篆書陽文印一，從圖版上看來，不論座石正面、人物肌理皆與上海博物館所藏封錫祿所製圓雕羅漢像之風格相近，但人物神態頗沈靜。

前述有封錫祿或封始岐款識的羅漢像，其座石與故宮所藏者不同，後者座石正、背皆窪淺深，前者正面則見橫向石紋，但是封始岐所雕者座石背面也是窪淺凹深。傳世中未曾見確定是施天章雕製的圓雕人物，但是他既然是封錫祿的弟子，封錫祿雕製人物時將之安排於座石上的情形，施天章亦有所繼承。施天章雕刻座石時，模仿元代畫家倪瓚側筆皴擦的折帶皴效果，所做坡石「高下頓折，望之如繪，皆前人所未有。」

總而言之，故宮所藏這件無款識的〈雕竹伏虎羅漢〉人物姿態與上海博物館所藏封錫祿雕製的羅漢像相似，老虎形貌則與鄭葉崇範所藏封始

岐雕製者相近，座石正面雕法雖與有封錫祿或封始岐款識者不完全相同，但與有封始岐款識者器背座石雕法約略相同。尺寸上，有封始岐款識者最小（高七公分），封錫祿所做者最大（高一五公分），故宮所藏者（高八·一五公分）與封始岐所做者比較接近。因此，故宮所藏這件〈雕竹伏虎羅漢〉與前述收藏在上海博物館之封錫祿雕製的羅漢像，以及美國鄭葉崇範收藏的封始岐款〈雕竹伏虎羅漢〉關係應相當密切，可能出自曾供職內廷的封氏藝匠或受藝於封氏的施天章之手。若考慮故宮所藏者人物肌理、眉目的表現方式比封錫祿所做者更成熟，依一般藝術發展曲線，多是從初起，漸漸進入成熟階段，到達高峰後，便日趨沒落，以便等待下一次的高峰期，則故宮所藏的這件〈雕竹伏虎羅漢〉或者並非出自封錫祿這輩藝匠（封錫祿、封錫璋）之手，而是出自其下一代子侄門生（封始岐、封始鎬、施天章）手中。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